

精英与平民

刘哲昕 著

什么是民主？是多数人的狂欢，还是少数人的操纵？是平民在大街上“抖发”，还是精英在角落里发狂？民主并非一个“一元化”的命题，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民主是精英与平民的对立统一。

中国人的民主生活

Elite and the Masses

法律出版社

精英与平民

中国人的民主生活

Elite and the Masses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英与平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 / 刘哲昕著.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18 - 5682 - 1

I. ①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21



精英与平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

刘哲昕 著

责任编辑 高山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印张 12.75 字数 282 千

版本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ISBN 978 - 7 - 5118 - 5682 - 1

定价:41.00 元

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言

历史正在西陵峡

这些年来,由于运用大尺度的历史方法研究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因此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完成转型,实现民主法治的梦想?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一语带过,抑或一笑置之。没错,这些年来,当我将历史的“缺口”对准现实的“准星”之后,未来的“目标”的确已经在我的视野中日见清晰。然而,我终究只是一名射手,不是一名算命先生。在子弹出膛之前,我可以调匀自己的呼吸,宁静自己的内心,忘却外界的扰攘,锁定远方的目标,在一场孤独而漫长的等待中,静静计算,默默祈祷,然而一旦扣动扳机,子弹出膛,那么所有的精确计算与美好愿望都必须接受各种不测因素的干扰和挑战,结果如何的确殊难预料。在一场远距离的狙击中,从风力风向到温度湿度,从地心引力到光学偏折,每一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射击的精度,乃至决定狙击的成败,因此一名真正的射手从来都是怵惕谨慎,不敢轻言结果。

然而那扳机终究还是要扣动，那子弹终究还是会出膛。射手是球场上最果敢的前锋，也是战场上最勇敢的战士，盘带是为了射门，等待是为了狙杀，“中国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彻底完成转型？”这个问题终究还是需要我们去面对，去回答。既然如此，那么今天我就借着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宏论，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唐德刚(1920~2009)，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中国近代人物口述史的主要推动者。1990年代，唐德刚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观点——“历史三峡”说，在华人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唐德刚先生认为，“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0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

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之洋了。”^{〔1〕}

“历史三峡”的观点主要记载于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中,这本著作对于新中国的历史和人物常有犀利辛辣的点评,也不免有失于隔岸观火的武断。不过就“历史三峡”的观点而言,唐德刚先生的确展示出了非凡的历史大局观,而将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转型称为两个“历史三峡”,也是再贴切不过的比喻了。长江之水,逶迤万里,泽被神州,的确堪当中国之象征;及水至巴蜀,山雄谷深,始有“长江三峡”之称谓。“长江三峡”,顾名思义,乃是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组成,西起奉节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全长193公里,两岸悬崖绝壁,江中滩峡相间,水流湍急难渡,堪称长江天险。唐德刚先生以三峡之险比喻中国大转型时的困难与惊险,可谓恰当;而以两次大转型将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分为“封建——帝制——民治”三个阶段,也可谓准确。

然而“历史三峡”的观点似乎也就止步于此了,唐先生鸟瞰历史的本领当然令人钦佩,不过如此的导航精度似乎不能让一个射手满

〔1〕〔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意。地理上的“三峡”逶迤数百里，瞿塘雄奇，巫峡秀丽，西陵险要，真可谓百转千回，各见奇美，“三峡”之谓，绝非笼统；既然如此，历史上的“三峡”同样持续数百年，其间跌宕摇摆，想必也是百转千回，各领风骚，又怎是一个“历史三峡”的笼统称谓就能全然揭示？唐德刚先生既然专工于中国近现代史，自然也是“历史三峡”中人，为何就不肯以如椽巨笔对其再作深描，而只肯以“三峡”为名笼而统之地称呼那历史的转型呢？笼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评价。倘若我们不能对历史阶段进行精确的细分，又如何能够对历史人物进行精准的评价？倘若每个历史阶段的出现都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主要历史人物的出现难道就不会是历史的必然吗？倘若历史阶段和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那种以古非今、以此非彼的评价是否就有可能失于主观和武断呢？三峡是连续的，历史是接力的。在崇山峻岭中，峡谷的每一次迂回其实都是为了让河流更好地向前奔流；在田径赛场上，接力的每一棒奔跑其实都是为了让队伍取得更好的成绩。当我们看到有人似乎在走弯路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他其实只是在跑弯道？当我们埋怨于那些跑弯道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倘若没有上一个弯道的奋力过渡，又怎会有下一个直道的完美冲刺？

“历史三峡”的确可以再作细分，而且十分巧合的是，“地理三峡”分为三段，“历史三峡”也是分为三段的。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观点，第一次“历史三峡”的开端始于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之后的商鞅变法，其实不然，第一次“历史三峡”的真正开端实乃始于春秋战国，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至此就已经名存实亡，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中国进入了空前纷乱的转型时期。春秋战国乃是第一次“历史三峡”的第一峡，或可称为“历史的瞿塘峡”，其阶段特点就是

“分”与“乱”：以封建制为特点的传统政治结构和以“天道礼乐”为特点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分崩离析，诸侯各国群起争霸，各种思潮百家争鸣。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争霸和争鸣，“历史三峡”开始进入第二峡，或可称为“历史的巫峡”。地理的巫峡绮丽幽深，“历史的巫峡”却雄奇短促，持续时间大概从秦灭六国始至秦朝灭亡止，其阶段特点就是“合”与“统”：数百年的残酷竞争催生出了乱世的“终结者”——秦国，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完成了国家的重新统一，而且企图在思想文化上也重新完成统一，从而导致了大一统体制的横空出世与焚书坑儒的悲剧上演。从春秋战国极度的“分”与“乱”，到秦朝极度的“合”与“统”，历史钟摆在受到巨大干扰之后完成了一次报复性的摆动。而既然是报复性摆动，那么从“分”的极端摆向“合”的极端就绝不会是最后的均衡，历史钟摆注定还会从“合”的极端再次摆回，然后经过多次渐弱的摆动之后，稳定在“有分有合”的历史均衡点上。这就是“历史三峡”的第三峡，或可称为“历史的西陵峡”，持续时间大概从汉朝建立到“汉武帝——董仲舒”时代，其阶段特点是“有分有合”：在尝过“分”与“合”两个极端的苦头之后，中国人经过汉初 70 年的过渡，最后在汉武帝和董仲舒手中融合了三代的“天道礼乐”与秦的“大一统”，实现了“分”与“合”的辩证统一，儒家与法家的辩证统一，中国终于穿出第一次“历史三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型。而这一次转型的成功，直接奠定了中国两千年不拔的基业。

倘若第一次“历史三峡”可以分为三段，那么第二次“历史三峡”显然也应该分为三段。第二次“历史的瞿塘峡”持续时间大致上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之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十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分”与“乱”：稳定了两千年之久的传统

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外来文明的冲击，再次陷于分崩离析之中，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思潮多元，论战激烈。而第二次“历史的巫峡”自然也是雄奇短促，持续时间大致上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其阶段特点十分类似于秦朝，也是“合”与“统”：经过上百年的政治军事文化竞争，历史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解放战争成功地终结了中国政治军事上的长期分裂，而文化大革命则失败地上演了一场企图消灭思想文化多样性的悲剧。与两千多年前一样，这同样是一次从“分”与“乱”的极端向“合”与“统”的极端的报复性摆动，历史的钟摆规律注定了这个过程的所有成功与失败，也注定了中国必将走向第二次“历史的西陵峡”，走向“分”与“合”的再度平衡。第二次“历史的西陵峡”大致上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起航，时至今日依然尚未出峡。钟摆犹在摆动中，历史正在西陵峡。

倘若历史正在西陵峡，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将“历史的西陵峡”再次细分成若干阶段呢？地理的西陵峡是分为四段的：香溪宽谷、西陵峡上段宽谷、庙南宽谷和西陵峡下段峡谷；倘以著名峡谷分，西陵峡也恰好有四个“峡中之峡”，俗称“西陵四峡”：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而不无巧合的是，地理的西陵峡分为四段，“历史的西陵峡”大致上也是分为四段的，比如第一次“历史的西陵峡”就是分为四段的：

第一段是“汉高祖——萧何”时代，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半分”。经过秦朝极度的“合”与“统”，历史钟摆再次从“合”的极端向“分”的极端摆回，然而这一次摆动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不可能再次触及“分”的极端，而只能达到“半分”的状态。秦朝试水“大一统”导致的暴政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中国人，很多人都将秦朝的

暴政归咎于对三代封建制的背离,因此主张以“黄老之道”治国,政治上重新封侯建国,经济上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家元气。面对国力衰败,民力凋敝的现实,汉高祖和萧何在一定意义上采纳了这一治国方略。然而“大一统”体制的诞生毕竟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矛盾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然已经登场,就不会轻易退场。也正因为如此,汉初的“封侯建国”虽然封了韩信、彭越等几个功臣当“异姓王”,但是很快就将这些“异姓王”贬的贬,杀的杀,最后基本上都换成了“同姓王”。与此同时,汉初的统治者也没有放弃中央集权,一边封王,一边委派官吏直接治理,大致上呈现出了“半封建半郡县”的格局。

第一次“历史的西陵峡”的第二段是“汉惠帝——曹参”时代,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继续坚持“半分”,继续休养生息政策。一代人的休养生息不足以让偌大的中国恢复元气,因此继任者必须坚持休养生息政策,做到不折腾。汉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时任齐国丞相的曹参听说这一消息后,告诉门客马上收拾行装,说自己要入朝当相国了,“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入朝之后,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日夜饮醇酒”(《史记》)。最后连汉惠帝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拐弯抹角地劝他干点正事,曹参却振振有词:既然你比不上高帝,我也比不上萧何,那么“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史记》)“萧规曹随”看似碌碌无为,其实为汉初恢复民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老百姓都称道“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

第一次“历史的西陵峡”的第三段是“文景之治”时代,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由分向合”,一方面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另一方面开始加强中央集权。汉文帝在位23年,笃信“黄老之道”,提倡与

民休息，实行“三十税一”，生活上省俭克奢，国防上移民实边。此时的汉朝国力已有一定增长，不过在与匈奴的较量中依然处于守势，在与同姓王的博弈中也多采取姑息政策，从而为国家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也将矛盾留给了后面的继任者；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汉景帝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景帝在位 16 年，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此时的汉朝国力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增长，“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然而即便如此，此时的汉朝在军事上依然无法与匈奴完全抗衡，在政治上也遭遇到了同姓王坐大之后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主张，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先是导致朝廷冤杀晁错，继而又被无路可退的中央全力挫败，最终导致封国势力迅速衰微，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充分说明在这场“分”与“合”的世纪较量中，历史的天平开始在摇摆中向“合”的一端倾斜，中国终于一只脚迈上了新型中央集权制的门槛。

第一次“历史的西陵峡”的第四段是“汉武帝——董仲舒”时代，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分合统一”。汉武帝初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等到窦太后去世之后，开始全面加强和创新中央集权制。经过汉初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此时的汉朝国力终于蒸蒸日上，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对匈奴的压倒性力量优势。时势造英雄，武帝刘彻横空出世。汉武帝 16 岁登基，70 岁驾崩，在位长达 54 年，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其后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他是中国完成第一次历史转型之临门一脚的射手，也是中国穿越第一次“历史三峡”之破浪而出的船长。在内政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制度性地解构诸侯王的势力，禁止诸侯国铸钱，集财政权于中央，并设十三道刺史，巡回

监察地方；在国防上，汉武帝主动出击，派大将军卫青、霍去病连续发动河西之战、河南之战和漠北之战，收复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将强敌匈奴彻底歼灭击溃。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从此一蹶不振，或南迁归附，或西迁远遁，彻底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匈奴既灭，广袤西域尽收眼底，征大宛，破楼兰，王师所至，威震四方，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西域既平，王师再兴，先征朝鲜，设汉四郡，再征闽越，又平西南，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至此基本一扫而光。政治军事的空前成就背后乃是治国理念的凤凰涅槃，汉武帝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已经不再是秦朝法家政治的简单复制，而是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新主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注入了德治的灵魂。儒家首创于孔子，孔子却推崇于周礼，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克己复礼”实乃对三代“天道礼乐”的继承和发扬。一边是中央集权，一边是儒家德治，一边是秦朝的“合”，一边是三代的“分”，汉武帝与董仲舒“儒表法里”的政治思想变革事实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与“合”的辩证统一。从春秋战国的“分”，到秦朝的“合”，再到汉朝的“分合统一”，经过数百年的艰难转型，中国终于在“汉武帝——董仲舒”时代穿出了第一次“历史三峡”。

然而历史的钟摆并没有就此停止摆动，文治武功的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穷兵黩武，使得钟摆再一次摆过了平衡点，又有走向暴政的危险。幸而武帝自己随后幡然醒悟，并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武帝驾崩之后，昭帝、宣帝先后即位，很好地执行了武帝晚年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税收，整顿吏治，安定

民生，汉朝进入了“昭宣中兴”时期，武帝后期已经摆过的历史钟摆终于被再次纠正了回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穿越第一次“历史三峡”的准确时点，的确应当如唐德刚先生所言，定在武帝和昭帝之间。然而即便如此，历史钟摆也没有从此一劳永逸地稳定在“分”与“合”的最佳平衡点上，恰恰相反，在随后的两千年时间里，历史钟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摆动，只不过摆动的幅度不再像“历史三峡”时期那么大而已。在汉武帝和董仲舒所奠定的新型中央集权制道路上，后世的中国继续在儒家与法家，王道与霸道，“分”与“合”的张力之间不断地摇摆向前。在道德自觉还能够发挥作用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摇摆基本上被控制在了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然而道德自觉总有失控的时候，一旦失控，那么摇摆就有可能逾越底线，失去平衡。到了这个时候，汉武帝和董仲舒所设计的体制就已经无法自我纠偏了，于是“王朝周期律”开始登场，以其体制外的破坏性力量对已经失衡的体制狠狠地踢上一脚，将其重新踢回原来的轨道，继续去玩它的平衡游戏去。倘若一脚还不足以将其踢回，那也只有继续狠狠地踢，一直踢到它回去为止。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连番苦难，大抵上便是受那历史大脚连番狠踢的缘故罢。此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见识过西方文明，没有见识过那种“契约型”的“分”，也没有见识过那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因此不可能知道汉武帝和董仲舒所设计的这个体制的根本缺陷究竟是什么，也不可能知道自己除了用脚踢那体制之外其实还可以用手来推，于是只能无奈地练了两千年的脚法。当然了，在这两千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西方人自己也过得惨兮兮的，甚至过得更加惨兮兮，原因是他们虽然没有患上什么“强迫症”，却患有先天遗传的“分裂症”，因此就算当时见到了西方人，中国人恐怕也是不会羡慕的。至于后来西方人居然一不留神

“先阔了起来”，而且还跑来狠狠地欺负了天朝一把，却是当年的中国人所始料未及的了。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深入了解第一次“历史的西陵峡”，应该可以为我们今天穿越第二次“历史的西陵峡”提供镜鉴：倘若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第二次“历史的西陵峡”，那么这段历史苦旅是否也可以分为四段呢？它的第一段是否也是在“休养生息”？它的第二段是否也是在“萧规曹随”？倘若这一切为真，那么此时的它是否已经身处第三段的中后期，一如两千年前的“文景之治”的中后期？而倘若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是否意味着第四段“文治武功”的梦想已经在不久的将来向我们招手？历史自有其规律，偶然之中有必然。历史人物的背后乃是历史阶段，历史阶段的背后乃是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是关于“分”与“合”辩证统一的规律，也是关于历史钟摆之能量守恒的规律。所谓“三峡”之喻，终究只是历史与地理的一次巧合，然而“分合”之辩，无疑却是人性与社会的永恒真理。当然了，历史规律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重复，“社会不过分与合”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两千年封建时代“分”与“合”的辩证统一，乃是“礼”的“等差”与“乐”的“混同”之间的辩证统一，其缺陷在于不管是“礼”还是“乐”，其实都是“柔软”有余，“刚强”不足；两千年帝制时代“分”与“合”的辩证统一，则是“礼乐”（儒家）的柔软与“法治”（法家）的刚强之间的辩证统一，其缺陷在于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其实都是“自上而下”有余，“自下而上”不足；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民主时代“分”与“合”的辩证统一，一定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辩证统一，政治向心力与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继承与学习的辩证统一。一旦完成这一次辩证统一，相信未来的中国就一定能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顺利穿越第二

次“历史三峡”，“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目 录

第一章 统一与分裂 001

历史决定未来? 002

地理环境差异决定了中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分裂 005

统一与分裂是中西政治生活方式分野的逻辑起点 012

第二章 民主与民族 024

民主与欧洲民族国家 024

民主与欧洲多民族国家 028

民主与非洲阿拉伯“部落国家” 035

民主与中国“天下国家” 051

民主与其他“类天下国家” 060

第三章 选举与信任 091

“信任民主”制度构想的提出 091

“信任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比较 096

“信任民主”的若干系统性命题 104

“信任民主”与民主测评制度 126

第四章 民主与精英 135

民主时代的精英统治? 135

信息不对称是民主的隐形杀手 145

经济不平等是民主的另一个隐形杀手 161

第五章 精英与平民 170

民主是精英与平民的统一 170

伪精英与伪平民 184

精英与平民的流动与变迁 195

第六章 资本与政治 225

西方社会的资本与政治 225

中国社会的资本与政治 241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256

第七章 平民与革命 271

革命是精英与平民的断裂 271

中国的革命与西方的革命 285

革命与改良的历史纠缠 295

第八章 自觉与倒逼 312

底线公平与机会公平 312

精英的自觉与平民的倒逼 325

精英与平民的对立统一 340

第九章 信仰与生活 348

我和汶川大地震 348

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 357

人生不过生与死，社会不过分与合 372

后 记 人在旅途 384